

與道德經濟交構的金錢幻術治理：  
以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為研究案例

趙彥寧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ant5354@gmail.com)。

本研究為綜合三期國科會研究計畫案的部分成果，計畫名稱分別為「國境管理、遷移產業與跨國底層階級的形成」（2004-2007年，計畫編號：NSC93-2412-H-029-006）、「國境邊區生命政治：種族、階級、情感」（2007-2010年，計畫編號：NSC96-2412-H-029-002-MY3）、「金錢政治：鉅變中的國境邊區道德經濟（2010-2013年，計畫編號：NSC-99-2410-H-029-043-MY3）。彭滄雯、鄭美芳、黃惠欣、紀穎如、蔡侑君、郝洪芳、吳靜芬、陳攻葵、周睿超、林培涵、葉守禮先後與我共赴福建省平潭縣進行田野調查，文中部分文獻承楊智傑、楊凱評、鍾光聖、周睿超費心蒐集，牛津大學毛彩霞同學與我分享研究發現，中研院社會所陳志柔研究員提供中國地方開發多元行動者研究文獻，在此一併致謝。

## 一、金錢幻術治理：

### 純然貨幣邏輯與暴富話語中的平潭經濟實驗區

平潭<sup>1</sup>比島外總是要遲上至少十年。改革開放 79 年，我們 89 年、90 年代才開始。發達的江浙一帶早就接觸到了、發達了，就我們福建省很多島也比我們強。本來海島應該是四通八達的地方，但我們被台灣擋到了。人家發展的時候，我們是國防前沿，直到這幾年兩岸關係改善了才比較好。解放以前，我的父輩、祖輩都去過台灣，乘船，很多帆船都去台灣做生意，當人力車車夫都有很多，和大陸反而接觸少；也有一部分留在台灣。我小時候祖輩經常講台灣的故事。我們不知道福州，但知道台灣：哪條街、哪條巷、什麼地方好，都知道。祖輩他們說我們這裡海產品是乾貨，像蝦皮什麼的，換台灣的洋粉〔即麵粉〕、砂糖、洋火〔即火柴〕，這些都不是大陸來的，是台灣來的。早期福建沿海會移民到南洋，但平潭就是去台灣，他們不知道南洋。開放以後福清大規模去日本，長樂去美國，平潭就是到台灣。（2011 年 7 月 18 日，平潭縣委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退休公務員王戎昌<sup>2</sup>跟我談平潭與台灣的關係）

廖金德邀我們去他和四位叔伯舅舅們投資重新裝潢的南岙大酒店。他們說，一共花了三百萬，部分是地下錢莊借來的，月利一點八到二點五都有，可是他們很有信心可以賺回來：「現在不是都講『五個共同』<sup>3</sup>？就是跟你台灣人一起賺錢嘛」。小廖十年前來北台灣打工，常上下南岙交流道，這也是其他四位股東長輩共同的記憶，該酒店故以此為名。其內設有「台北廳」、「新竹廳」、「台中廳」、「台南廳」、「高雄廳」等大型豪華包廂，懸掛巨型水晶吊燈，一面牆鑲為暗色玻璃，一面鋪滿六吋見方高級花紋壁磚，磚間距離極微，顯示鋪工不凡；我如此稱讚時，小廖的二伯微笑：「是這樣沒錯。這是我監工的。我九幾年在你台灣，就是做壁磚」。酒店準備專做台灣客，我們被力邀留下在「新竹廳」吃午飯，「嚐嚐看是不是到位？有沒有符合你台灣人的口味？」。席間喝過幾句法國干邑（小廖特別強調：「這酒挺好，你台灣人應該喝得出來」），小舅臉紅紅，既興奮又感慨：「我小時候家裡窮，沒讀書，放羊。放羊的時候呢，時常天上就飄下來你台灣空投的宣傳品，放在透明塑料罐裡，裡頭還有美女照片，後來才知道，是鄧麗君。那罐子好漂亮，又實用，我們東澳家家戶戶，沒有不收藏的，都說台灣來的東西好。唉呀，那個時候怎麼會想到，有一天可

<sup>1</sup> 源於議題的敏感性，在趙彥寧（2007；2010）過去有關無證移民和跨境母職的研究論文中，「平潭」皆化名為「永樂」。然而隨著 2010 年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成立，該島的發展不僅廣受兩岸媒體報導，實驗區的政治意涵也成為立法院質詢行政院長和陸委會的焦點之一（如，自由電子報 2012），化名的必要性故不再存在。

<sup>2</sup> 為求保護受訪者，本文所有報導人皆為假名，若干足以顯示其身分的資料，亦略做修改。

<sup>3</sup> 平潭綜合實驗區設置伊始，即提出與台商「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五個共同」。

以跟你台灣人平起平坐談生意！」大伯是酒店的董事長，他也笑著下了結論：「現在我們這個實驗區就是跟深圳學的，大陸這邊準備香港回歸，就設了深圳特區，慢慢地香港人各方面都依賴深圳，那麼它不回歸也是不行的。所以平潭這幾年搞好了，水到渠成，台灣也就回歸了，那時候，我們兩邊完全平起平坐，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兄弟了。你說是不是啊？」（2012年7月20日平潭南嶽大酒店田野筆記）

本研究試圖藉由金錢政治這個議題，以試圖分析閩北國境邊區正在經歷巨大變遷的道德經濟體系。本文對於「金錢政治」的操作型研究定義為：藉由個人與其所屬社群的金錢運用實作與想像、境內和跨境金錢流通和轉移的途徑和策略、以及以貨幣制度為基本計量基礎的商品化交易關係（包括親密領域的商品化計量關係）等議題，以探究個人、社群、和體制化政治機構（包括制訂、規範和協商相關法規的地方政府相關機構）的權力組織技術和實作方式。延續早期經濟人類學者的概念（Parry and Bloch 1989；Sahlins 1977；Scott 1977；Thompson 1971），本文將「道德經濟」定義為「社會正義、人際倫理和經濟利益互相建構、並彼此強化正當性的社會場域」；我也使用「道德經濟性」一詞，以指涉經濟活動所生產、再生產或改變的道德價值，而這個道德價值或為整體社會的道德秩序所規範、也可能僅為特定經濟活動參與者所共享。然與前述研究者所分析之相對封閉的文化和經濟體不同者，本研究試圖探究的「國境邊區」並非純然為中台兩地沿著國境（即臺灣海峽中線）所形成的地理區塊，而是經由來回跨越國境邊區之閩北底層人士在境內和跨境遷移過程和勞動狀態中，所生產和再生產之社會關係（包括親密關係、社會倫理、雇傭關係、跨種族連結關係）與自我生命治理所涵蓋的地理區位、以及這些人士和形塑其生命政治之國家治理機器與其代理者（譬如下文將提到的「平潭綜合實驗區管理委員會」）互相遭逢的社會場域。

該區塊的經濟型態和勞動內容，高度仰賴中國東南沿海城鄉發展與消費模式、台灣經濟的榮枯、以及特別是兩岸的政經互動關係。根據1998年版《平潭縣誌》<sup>4</sup>和最晚近公布的統計年鑒（平潭縣統計局 2010），2011年以前仍隸屬於

---

<sup>4</sup>這是最晚近版本的縣誌。2012年底平潭將廢除縣級地方政府機構，改由2010年成立的「平潭綜合實驗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主管所有行政事務。僅由自1998年至今皆無更新版本的縣治出版一事，即可窺知在實驗區成立之前，平潭島的地方發展如何停滯不前、且如何不受到福建省（更遑論中共中央）的重視。

福州市的平潭縣由126個島嶼和702塊岩礁組成，主島海壇島（簡稱「嵐」）面積267.13平方公里，是福建第一大島，中國第五大島，<sup>5</sup>也是中國距離台灣最近的領土，以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偷渡者使用的小型機動舢舨來說，約六個小時即可到達直線距離最近的新竹南寮。百餘年來，平潭一向被外地人視為福建沿海的貧窮島嶼，「廈門富、金門貴、平潭貧、東山賤」的俚語具體地描繪了清治時期該四島的經濟與社會位階。而平潭之所以「貧」，在前現代社會小農經濟時期，顯然與其先天資源的匱乏有關：該島並無工業，氣候乾燥且（在2011年實驗區成立以前）幾無防風建設，「一夕風沙起，埋沒十八村」的說法流傳百年，故而土地貧瘠，花生為主要維生作物，至今依然（趙彥寧 2007）。<sup>6</sup>中國解放後，全國統一的貨幣制度成為衡量地區經濟發達與否的基礎，1978年平潭縣統計局開始公布統計年鑒，1987年該縣劃為福建省十七個貧窮縣之一，1995年總人口36.23萬人，預算內總收入僅達5,942萬人民幣（平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314）；本世紀前十年平潭經濟大幅成長，2009年末戶籍內總人口數38.97萬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30元，但仍低於當年全國的平均數值17,175元，並遠低於前四大島。不過，在此必須強調，中國的官方統計資料的翔實度可議，僅可作為參考；僅就人均收入而言，該項統計的調查基礎為戶口制度，且未納入所謂的「灰色收入」（王小魯 2007），故而忽視大

---

<sup>5</sup> 就中國方面的角度，前四大島依次為台灣、海南、崇明、舟山；然而，同樣正在開發引資招商的廣東湛江東海島和大連長興島也自對外聲稱為第五大島。目前並無官方公布的全國島嶼面積統一數據，不過，平潭人本身不認為此事有何爭議，因為自小即接受該島為第五大島的說法。

<sup>6</sup> 不過，其歷代身為國防前沿、以及接近台灣的地理位置，也決定性地影響了該島的發展與否、以及以和種形式發展。可參照《平潭縣誌》（1998：2）的官方說法：

據民國《平潭縣誌》引《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州府志》：唐為牧馬地，宋初置牧監，不久撤銷，允許島民耕作，並增兵駐守。宋嘉佑四年（1059年）在鐘門（今屬蘇澳鎮）設巡檢司，掌管海上巡防。明洪武年間，為防備倭寇襲擾，強迫島民遷徙內地，致使島上百業荒廢，滿目瘡痍。此後，又因數度「禁海」、「遷界」，極大地制約著平潭海洋產業與對外交往的發展。直至清雍正五年（1727年）禁令解除後，漁業生產與海上運輸開始復甦。清咸豐（1851～1861年）以後，平潭成為福建對台貿易主要口岸之一。（...）然而，平潭長期未能獨立建制，歷代政府只顧屯兵固防、設卡取稅，對經濟、文化投入甚微，因而，始終未能改變平潭落後封閉的狀態。

如同我做過參與觀察的幾處閩北沿海漁村，平潭常民對上述官方歷史並不清楚、也乏興趣了解。民間口述流傳的該島移民史則是，「很久以前」平潭乃大陸罪犯的流放地，這個說法與改革開放後的「偷渡島」自我認同具有高度親近性，故而不少報導人半自嘲地以「窮山惡水出刁民」一詞以同時指涉平潭與平潭人；另，煩請讀者注意，「窮」、「惡」、「刁」等字彙，皆蘊含道德經濟的評斷。

量平潭人在外打工、且勞動形式多為地下或非法的事實。平潭人究竟是貧還是富？在地人的說法兩極，持貧窮論者皆是出外打工、或投資外省工程項目連續失敗者，其說法均是：「就是因為沒錢，才會去你台灣（或「說是兩個人就有一個得愛滋」的南非、「地下都埋著炸彈」的以色列、和「恐怖份子很多」的伊拉克）賺你們那裡一點點小錢」。而持富有論者，則強調該地貧富兩極分化狀況下的相對剝奪感，並多藉由指涉（不知名的）他人類同Thorstein Veblen（1967）所謂的「炫富型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以凸顯個人匱乏的財物（但是相對完善的道德實作）。其敘事相當一致，且高度服膺在地社會的性別分工意識型態<sup>7</sup>：「平潭有錢人很多啊！〔或『平潭有錢的人那真的是很有錢』〕有錢（的男）人平常都不在平潭，可是過年的時候你來這裡看看，城關〔指「縣城」，縣人民政府所在地〕街上都是名車，車太多，路根本就開不動」、「平潭人就是喜歡攀比，你看，三年前大家都買保時捷（Porsche）的卡宴（Cayenne）、<sup>8</sup>兩年前是路虎（Land Rover）、<sup>9</sup>再下來一年大家都買保時捷的四門跑車，<sup>10</sup>沒有一輛的價錢少過一百萬（人民幣）」、<sup>11</sup>「有錢的老闆買車，不管有沒有錢的（男人）都戴金項鍊，幾兩幾兩的金子給它打下去，越粗越好看」、「老公在外地賺錢平常不回家，平潭女人她沒事做，白天就去做美容護

---

<sup>7</sup> 可參見趙彥寧（2010）的分析；另，由該研究可知，如同所有意識型態皆無法「縫合」（suture）社會生活一般（Laclau and Mouffe 2001），加以歷經跨境遷移的生命經驗，平潭傳統的（或「理想型」的）性別分工體系正在劇烈改變中；進一步的討論，可見本文第二和第三節。

<sup>8</sup> 在台稱作「凱燕」，係為兼具 SUV（Sport Utility Vehicle）和跑車功能的車款，因此據說是跑得最快的運動型越野車。根據「易車網」的數據，該車款在 2012 年的售價，根據其不同的配置，在 90 萬到 210 萬人民幣之間（<http://car.bitauto.com/baoshijiecayenne/>）。而根據「百度百科」的說法，2002 年「保時捷卡宴」進入中國市場，2006 年「保時捷中國」銷出 2,305 台車，其中「卡宴」佔了約百分之八十的 1,930 台（<http://www.baidu.com/s?fr=bks0000&cl=3&wd=%BF%A8%D1%E7&t=5>）。

<sup>9</sup> 英國越野名車，係 SUV 車系的頂尖老牌，該品牌的車種眾多，在中國市場的價格低至四十萬、而高自四百萬人民幣。

<sup>10</sup> 應指 Panamera（中文名「帕拉梅拉」）的四門跑車，首次亮相於 2009 年上海車展，根據車內配置的差異，報價為 110 萬至 310 萬人民幣之間。

<sup>11</sup> 名車顯然是全中國不分城鄉差異的一致炫富手段，然車種之選擇，也具有高度在地社會脈絡性的意義。正文所述的三種車款皆為 SUV，主因有能力採取此炫富手段者，皆為在西北偏省從事隧道和礦產工程項目的「老闆」（即工頭）。根據多位報導人的說法，2010 年之前從事這些項目頗易暴富，老闆同時也配置寶馬（BMW）與奔馳（BENZ）等價格在一百至兩百萬間的名車，供其家人平日在平潭使用，而晚近幾年因為正文將說明的理由，工程項目的取得不易，投資失敗而破產者日多，寶馬與奔馳車也少見了。

膚啦、美白保養啦，把自己搞得漂漂亮亮，給自己看、也給別人看嘛」、

「（女人）白天都打牌，晚上嘛有的就去舞廳跳舞，泡小白臉的也是不少，很多啊就是這樣把老公的錢給搞光」、「所以你看，全中國哪裡有像平潭城關這麼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卻有這麼多美容護膚店呢？」。

然而，前引具強烈視覺展演性（visual performativity）的炫富實作，也彰顯了平潭在地經濟的高度不穩定性（以及「富裕」之概念的虛幻性）。與諸如 Nancy Chen（2008）、Elisabeth Croll（2006）、Deborah Davis（2006）、Zhang Li（2008）等從事中國城市研究之學者所發現者有異，前述擬 Veblen 式的炫富型消費與中產階級興起之關連可議。為何如此？最關鍵的原因為，其致富途徑皆屬「灰色」項目，無助地方政府稅收，以致於該島民生建設頗差：比如，2010 年實驗區開始建設以前，即便城關中心也乏水泥道路，一旦下雨，便泥濘難行，因此，前引「街上都是名車，車太多，路根本就開不動」的說法，不盡然在表述名車如何之多，也暗示了城關巷道如何之窄、以及如何難以承擔同類型中國三線城市的一般交通；再比如，平潭水電供應一向不足，即使在實驗區成立後，不少城關居民仍須自費鑿井並儘量儲水，否則無法因應每隔數日即無告停止自來水供應的狀況；等等。其次，平潭男性的致富途徑相當單一，除了極少數的例外，<sup>12</sup>他們多在 198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偷渡來台打工，以首次偷渡所得（所謂的「賺了第一桶金」）在城關自建樓房、或購買 2010 年實驗區成立以前乏人投資的小區商品房做為新婚之用；換句話說，住房固然可能內部裝潢頗佳，但既不在彰顯個人「生活品味」、「休閒志趣」<sup>13</sup>或感官經驗的轉變，

---

<sup>12</sup> 最常被引述的例子，為 1990 年代初期以沿海海運發跡的某氏兄弟；根據報導人們的說法，二人皆因青年時憑藉出眾的交際手腕或不凡的外貌而建立有力的關係網絡，並藉此尋得寡佔性的海運商機。

<sup>13</sup> 此類報導人家中最顯著的裝潢有三：至少五十吋的液晶電視、家庭劇院式的環繞音響、以及理論上供全家成員環坐觀賞電視的黑色皮面沙發，但這多僅是彰顯男性家戶長致富成就的必要裝備。比如，林平在 2006 年遣返後，他翻修增建在城關的老房，之後即赴江西「搞高鐵的項目」，2011 年初因正文將提到的「劉志軍事件」暫返平潭「再找找機會」。我和兩位助理在當年七月十九日早上拜訪林家，一進門，林氏夫妻便邀我們坐在客廳皮沙發上觀看佔據整個牆面的液晶電視，當時 CCTV 正在實況轉播西藏解放六十週年在該自治區舉辦的慶祝活動，除了習近平出來講話時，林平漫應一句「嗯，這是習近平」、以及轉播結束後的結論「好像沒聽過平潭人去搞西藏高鐵的，那個項目檔次太高，搞不來」之外，西藏（以及西藏解放）顯然與他認知（並且可以參與實作）的世界毫無關係。

<sup>14</sup>亦非投資增值的商品項目。而這些男性之後的境外打工所得，多投入外省隧道建設（以及晚近兩三年煤礦以及鋁礦等稀有礦產開發）的工程項目；當時正逢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發展大西北以及積極鋪設高鐵的階段，「打隧道的項目哪個省沒有？哪個地方沒有我平潭人在挖隧道？」，平潭的隧道團隊事實上是國營企業得標後分包末尾的最小包，<sup>15</sup>報導人們從不諱言在如此多層分包的狀況下，他們之可以暴富（即取得百倍或甚至千倍的暴利），純因「偷工減料鑽漏洞」。<sup>16</sup>尤其在 2008 年下半年，中國政府爲了因應國際金融危機而進行「大躍進式」的高鐵建設時，不論城關抑或農村，平潭許多家族莫不集資「搞項目」；然而，隨著鐵道事故攀升，2009 年起該地即盛傳鐵道部長劉志軍「會出事」，其後兩年工程工安檢查日嚴，2011 年二月劉被免去部長之職，至此，隧道暴富夢灰飛湮滅，而短短數年間許多家戶也歷經了「沒錢」到暴富、再回到「沒錢」或甚至舉債的過程。

---

<sup>14</sup> Walter Benjamin 曾以十九世紀中期西歐常民生活爲例，指出新興科技商品（比如照相、玻璃和鋼骨建築）也轉化了人們的感官體會（可參見 Buck-Morss 1991）。但是這個現象顯然不見於平潭。比方說，報導人可能會購買皮面大型沙發，但是這不表示他們因而學會了欣賞高級皮件的興趣、事實上也顯然不在乎皮料的真假，若沙發掉落皮屑（或塑料碎屑），也不在意。

<sup>15</sup> 其層層分包的作業方式與台灣雷同。比方說，中鐵某某局集團有限公司取得連通西北某二省鐵路建設的標案，之後根據高速、隧道、橋樑、地面建築等項目各自分出中包，平潭人熟悉的隧道項目，又根據全程各段路線畫出小包範圍，而一般由親族好友組成的團隊（核心幹部通常少於二十人）再透過與在地政府相關公務人員「打關係」的途徑取得最小包，得包後，上述核心幹部擔任監工，實際動手挖掘隧道者則爲在地募集的農民工。得包的關鍵階段在於「打對關係」，過程可以長達兩三年，其手段則不出財與色形式的「送禮」，這方面的故事不勝枚舉，每位成年男子皆可轉述數則，形同平潭版的「都市傳奇」（urban legend）。我聽過（我個人以爲）最驚人的「禮物」出自當事人阿輝口中：2009 至 2010 年底，他與友人在西部某省山區「搞項目」，爲求與縣政府發改委稽查組「搞好關係」，曾透過某中學校長（另，這當然也要「送禮搞關係」）舉辦校園選美活動，供該縣相關領導以「皇帝選妃」之姿，挑選中意的女學生們做爲二奶；另，阿輝本人不認爲這有何驚人之處：「大陸哪裡的官都是這麼黑啊！女學生也都很願意啊！」

<sup>16</sup> 因爲前註所述以工程項目得取暴富之關鍵階段崎嶇艱辛、又不保證必然成功（比如前註所引的阿輝，最終還是拿不到該項目，整個家族因此虧損近百萬），報導人們顯然皆認爲偷工減料實屬必要（「不然我們要賺什麼？」）。「偷工減料」的手段除了字面上的作法（尤以轉賣鋼筋爲然），主要在經由抽水等方式，故意製造隧道頂部的落石或滲水工安意外，以追加工程補助款。就轉賣鋼筋來說，某報導人直爽地表示：

鋼筋的價錢這十年國際市場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你國家哩鋼筋比如說（規定）做一個隧道一千噸，他就拿五百噸去賣掉，給我們老鄉去買，一年再怎麼樣都可以賺一兩百萬。你聽不懂怎麼賺啊？比如說你要賣給我，我先不付錢給你嘛，我先拉出去，因爲大家都平潭人很熟嘛，見過幾次面啊打打招呼就好啦。好，我拉出去賣了，我錢拿回來放在口袋裡，剩下再拿回去給你，這樣你懂了吧？所以說，買鋼筋的人根本不用本錢也可以賺到錢。

表面上看來，平潭人追尋暴富的慾望與晚近二十年的中國常民一致，<sup>17</sup>而實踐該慾望的過程裡顯然不能不遭逢的「貪官敘事」，也和全國其他地區無異；<sup>18</sup>然而，形塑該慾望的動機和限制、以及「貪官敘事」在此過程裡發揮的作用，卻具有關鍵性的差異。首先，對平潭人而言，「貪官」並非窺奇的對象，而是（希冀暴富的過程中）必須實際交逢和協商的資源分配者；此類敘事故而多為血淚辛酸與炫耀攀比較織的見證（testimony），炫耀攀比之概念類似 Jane A. Margold（1995）分析東南亞男性移工自我敘事時所提出的「邊境男性氣概」（border masculinity），而「貪官」諸種貪欲的作為，也間接彰顯了邊境男子「出外打拼以養家活口」的男性美德。<sup>19</sup>其次，最重要的是，固然是中國市場經濟崛起後橫行的各地貪官們左決了平潭的貧富分化，更是 David Harvey（2006）所謂的「不均地理發展」（unequal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政經結構決定性地形塑了該島的經濟活動樣貌。不過 Harvey 倡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金融重組模式，必須鑲嵌在中國解放後，平潭與福建省外、以及特別是與台灣之間的國境邊區關係裡，方具有在地性的意義。如本節起頭處所引前發改委公務人員王戎昌所言，源自特殊地緣關係，與閩北福清和長樂等「偷渡鄉」不同，平潭人對於「美好他鄉」的想像範疇總是聚焦在台灣，在民國時期，甚至諸如麵粉和火柴等「洋貨」也莫不來自台灣。中國解放後，平潭成了「戰爭前沿」，在「深挖洞，廣積糧」的文革時代，駐滿平潭山上的解放軍徵召民工挖掘隧道，改革開放後，這也成了當地男性赴外省打工的基本技術（或唯一的特殊技術）；晚近十多年，兩岸關係緊張時，該島亦為軍事演習重地，比如，1996年台灣舉行總統大選，該年三月中共中央軍委重兵佈署福建東南沿海，三軍和導彈部隊入駐平潭，位於該島東南的將軍山便作為前線指揮所。基於同樣「戰爭前沿」的考量，除了廈門經濟特區，福建省歷來缺乏基礎和工業建設，整體發展遠遠

---

<sup>17</sup> 「一夜暴富」的敘事，顯然也是晚近全中國社會的「都市傳奇」，在 Google 搜尋網站鍵入「暴富」的關鍵詞，即可取得一千兩百三十萬則相關訊息，且大型商業資訊網站（比如「阿里巴巴」）莫不廣為招徠「一夜暴富」的投資項目（取用日期：2012年8月22日）。

<sup>18</sup> 伴隨著 1998 年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的一系列打貪行動，具有高度窺奇性質的「貪官敘事」也成為正式與非正式（即網路連載）的紅火出版品；僅就前者而論，暢銷者不一而足，或可參見大洋（2002）；何能高（2006）；鳳凰週刊（2011）。在此特別感謝周睿超代我蒐集相關資料。

<sup>19</sup> 實情當然不盡然如此，且男女的道德經濟自我敘事具有差異性，可參見本文後的分析、以及趙彥寧（2010）。



落後於沿海諸省，更遑論緊鄰的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區。為求發展，2004年初，福建省委省政府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設「對外開放、協調發展、全面繁榮」的「海峽西岸經濟區」（以下簡稱「海西特區」）建設方案。<sup>20</sup>此處所謂的「對外」，實指台灣（意即「海峽東岸」），然而當時兩岸仍處於備戰狀態，該構想並未具體執行，如此可以確知，該省（包括平潭）的經濟結構、政府行政、文化教育的發展與不發展，皆侷限性地結構化於兩岸政治關係裡；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長李鴻階等人在2000年發表的調查報告即指出，2009年的數據顯示，該省GDP在東部地區排第八位、人均GDP排第九位，且差距逐步擴大（李鴻階、廖萌、林在明2010）。

兩岸政治關係（或更確切地說，中共中央因應台灣政黨政治變化而制定的兩岸政策）如此全面性地影響福建省與特別是平潭島的經濟發展可能、而經濟發展指數又如此絕對性地被中國不分城鄉的人民視為唯一的幸福指標

（Anagnost 2004, 2006；Farquahar 1996；Rosen 2004），以致於該區常民較諸它省者更加密切關懷每隔四年的台灣總統大選結果，並幻視（*mis-conceive*）<sup>21</sup>該選舉唯一的動機及其效果為改變或不改變兩岸關係、並因此提昇抑或破壞閩北的經濟發展。也正因為在地常民無法參與並影響台灣大選，其焦慮、恐懼、期待的情感尤為強烈，也總將之轉移到我們這個來自台灣的研究團隊身上，以期再次證成（*reconfirm*）其幻視的正當性。比如，2008年初舊曆年間，預期民進黨將因受制於前任總統國務機要費等案而「輸掉」總統大選，我們在閩東霞浦和閩北諸地的報導人皆興奮不已，凡從事漁業勞務和商品互銷等兩岸經濟活動的仲介皆積極與我接洽「共同致富的商機」；2011年七月我們參訪福建省某研究機構時，甫結束儀式性的禮貌對談，對方領導便傾身詢問我：「你認為明年台灣的選舉，是馬英九會選上呢？還是蔡英文？」；再比如，在本節前引2012年七月南嶽大酒店午餐將結束時，小廖的小舅也認真地試圖向我和助理確

---

<sup>20</sup> 並通過「實施項目帶動、發展縣域經濟、培育產業集群、發展中心城市、提昇民營經濟、轉變政府職能、促進文化振興、推動海洋開發」等八大舉措。

<sup>21</sup> 在此沿用 Louis Althusser（1971）和 Slavoj Žižek（1989）的觀點：被官方經濟發展邏輯意識型態化（*ideologized*）的平潭常民，不由自主地採取了官方建構的意識型態主體位置，將成功發展/發展停滯的二元對立關係歸因為其實並不相關之它者（意即台灣政治領袖的政黨背景）的善意或惡意介入，因此在無視國家暴力的事實時，也強化了國家權力的運作效力。

認：「你們應該都是投票給馬英九的吧？」<sup>22</sup>中國對台（以及部分對內）經濟政策的制定確實與台灣政黨政治的選舉結果直接相關，福建省也確實是最明顯的例子：2008年台灣政黨再度輪替後，中國政府方開始積極推動海西經濟區的計畫。2009年，中國國務院批准「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計畫」，並明確支持「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案」，該案且為中共建國後第十二個五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簡稱「十二五規劃」<sup>23</sup>）的重點項目。「加強兩岸交流與合作」是該項目的指標，以之後將不斷重述的官方話語來說，其目的則為：

積極探索兩岸合作新模式。積極爭取國家支援，推動設立兩岸合作的新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實施旅遊購物、人員往來、貿易投資等特殊政策，推動兩岸金融合作，實施方便台胞就業生活的措施和財政稅收優惠政策；積極探索「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兩岸合作新模式，廣泛吸引台灣規劃機構、各界人士參與開發建設，推動兩岸同胞共建幸福家園，實現互利共贏。（華夏經緯網 2011）

2011年初平潭福清跨海大橋建成之後，過去遍佈福清至平潭高速路、以及平潭漁村的「嚴厲打擊偷私渡」、「在此偷渡 死路一條」、「參與偷渡可恥 勞動致富光榮」和「計畫生育功在當代 利在後世」、「計畫生育好 致富又養老」等標語，已全然為「和諧海西」、「創造平潭速度 推動跨越發展」、「爭分奪秒趕工期 勞動競賽創一流」、「兩岸合作 先行先試 建設共同家園」等等所取代。當年年初開始移山填海工程，過去連接大陸海上接駁的娘宮岸邊鹽田在年底填平，改名為「金井灣」，簡稱「新區」；預定在該新生地建造的「海峽如意城」豪宅，於次年六月開盤，<sup>24</sup>而台資企業冠捷科技亦預定於2013年五月在此設廠；同段時間裡，環島公路開始建設；過去與台灣海上貿易和非正式與地下勞工輸出最頻繁的東澳港，在該年年底建成高速客運滾動碼頭，「海峽號」客輪在十一月三十日首航台中港；年底「平潭綜合實驗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緊鄰跨海大橋和海峽如意城設立，一年後完全取代原縣政府的

---

<sup>22</sup> 當我誠實地表示自己並未投票時，他們驚訝不已，驚訝的不是我沒投給他們設定的候選人，而是「原來可以不用投票」。很顯然地，絕大多數的平潭人訴諸與本文所分析的諸種致富經濟活動類似之「道德律命」，來理解政黨政治體制下的公民行動。

<sup>23</sup> 有關該計畫綱要，可參見新華社（2011）。

<sup>24</sup> 建設該豪宅的建設公司為香港的世茂、恒基、新鴻基、以及台灣的遠雄和東元所共組的集團。另，「開盤」意指規劃完成、開始販售預售屋。

行政功能；預定在該實驗區內，台灣居民將可免簽證入島、商品免減免稅、同時使用新台幣和人民幣、參照港澳模式，兩岸車輛無需換牌即可互相登陸、台灣居民若在此定居，甚至可以直接參與該區的行政管理；等等。<sup>25</sup>或許最關鍵的是，上至管委會主任，下至本文將分析的未久即發現自己被排除於實驗區發展之外的底層常民，「一年一個億，一天一個樣」、「一年一個億，三年一千億」的口號人人朗朗上口，意在表述中共中央以創記錄地每日一億元人民幣的氣魄投入平潭開發，該島建設必可以日新月異的形貌不斷地展現——誠如不分背景的眾多報導人所說：「錢，是萬能的，有錢就好辦事，平潭以前沒有錢，所以就落後就沒有建設，現在政府每天給平潭一個億，那平潭怎麼會不發展？」，接下來一句話多半就是：「政府投這多錢在平潭，就是爲了你台灣人、優惠你台灣人，所以你來平潭投資，當然就會賺錢」。

囿於篇幅，本文不在分析該經濟特區的設置是否已然反應、或終將影響台灣政黨政治、經濟發展和生活形貌的兩岸政策，<sup>26</sup>亦無意探究「一天一個億」的說法之後，所隱藏的（以國務院爲代表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同時包括管委會、縣政府、與村幹部）、國營企業建設公司、以及外資（港資、台資）建設集團等行動者在多邊謀利上所扮演的角色——儘管根據在地台商、退休公務人員、以及外來資深投資客私底下的說法，「一天一個億」不過是個數字魔術：首先，中央加地方政府具體出資的數字僅爲一年八個億，其中一個億需由財政枯竭的地方政府自籌，經由都市規劃而進行的土地販賣，因此成爲籌資的首要途徑，而拆遷與農民尋求補償和移居則爲必然的結果；其次，全島建設皆發包給國營企業，由於國企可向地方銀行無息貸款，且無償還期限的規定，「國家從左邊口袋掏出錢，再放進右邊口袋裡」故成爲報導人形容中央政府如

---

<sup>25</sup> 有興趣更全面性理解該實驗區建設方案的讀者，可參見其入口網站（<http://www.pingtan.net/1/>）。

<sup>26</sup> 2012年三月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陸委會已明確表示「不接受一國兩制」，並反對台灣居民擔任平潭實驗區共同管理之職。不過，台中、新竹、基隆和金門等執政黨主政的縣市長，皆積極以海峽直航和互相投資等形式參與該實驗區的發展；早在2009年九月，官方色彩甚深的中興、世曦、中鼎、亞新四大工程公司即組成策略聯盟，向實驗區管委會提交規劃服務建議書；當年年底，具有執政黨中常委身分的春保錫鋼集團總裁廖萬隆考察平潭，並公開發言鼓勵台商來此投資；等等。反對黨顯然也未完全置身事外：比如，2011年六月平潭管委會特別針對「台灣南部的底層人民」而發佈「台胞來平台創業就業的優惠政策」，該月中在高雄金典酒店舉辦「平潭實驗區開放開發說明會」，受邀致詞的檯面下協辦單位即爲該市都發局局長；2012年總統大選敗選後不久，高市民進黨議員康裕成也公開向該市市長兼黨主席陳菊建言宜派員考察平潭。

何藉此取得暴利的口頭禪。<sup>27</sup>延續本節前述，平潭常民在長期依附台灣和國內「不均地理經濟發展」脈絡下的道德經濟實作分析，我將在其後兩節依序討論（一）在形同「金錢幻術政治」的國家治理操作下，在地人民如何理解並因應（或是否有能力因應）以發展速度掛帥的「平潭速度」？（二）貌似新自由主義的「平潭質量的自由市場」語境裡，平潭常民如何或是否進行某些中國研究學者所謂的自我生命治理？最後，本個案研究對於吾人了解當代中國社會變遷、抑或國家與市場合謀的暴力實作，可以有何幫助？本文第三節也將藉由回顧道德經濟的相關文獻，以試圖回應這個問題。

## 二、永遠追趕不上的「平潭速度」：

### 不斷被確認的次等公民身分

海峽大橋是福建省內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跨海大橋，從開工伊始，就不斷刷新著國內橋樑建設速度的紀錄。大橋去年 11 月開始通車，比原訂計畫整整提早了九個月。今年三月份，蒞嵐考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滿意地說：「平潭開放開發不是一般的事情，就是要體現高效率、高效益，就是要體現平潭速度。」副橋能否複製這一奇蹟，甚至超越這一速度？（福清新聞網 2011）

2011 年底，海峽如意城進入平潭人的視野，成為全島矚目的時代巨擎。2012 年 3 月，海峽如意城率先在美推介，引發海外投資大亨趨之若鶩。5 月，海峽如意城展示中心耀世揭幕，一抹華彩綻放平潭夜空。6 月 13 日，海峽如意城首批高層住宅雍景苑一期開盤，短短數小時即宣告售罄！創下「時光」傳奇！時代的鉅獻，7000 年的等待換一次絕美邂逅。這座扛鼎平潭綜合實驗區拓步大發展的世界級綜合項目，在敞開大門，喜迎未來主人的那一刻便上演了一幕火爆萬分，人潮如織的喜慶盛宴。「海峽如意城緊鄰平潭政府新區行政中心，五星級酒店，大型購物中心也近在咫尺，我相信這裡會成為平潭新的城市中心」，平潭人張先生毫不掩飾對新區未來規劃的期待。而從福州專程趕來買房的陳小姐表示：「平潭已經是特區地位了，這兩年平潭的房價一翻再翻，終於等來了有檔次的大項目，這次一定要抓住機會，我家的親戚都出手了。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啊！」（新浪房產 2012）

<sup>27</sup> 儘管我尚無能力和田野調查研究管道以驗證以上說法的正確性，但證諸歷來的相關研究，可知此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常態模式；可參見周飛舟（2010；2012）。我特別感謝中研院社會所陳志柔研究員與我討論這個議題，並熱心提供相關參考文獻。

薛晴<sup>28</sup>開車載我們去她投資經營的兒童才藝培訓中心。她中專舞蹈科畢業後，在北厝某小學擔任才藝教師，北厝是離金井灣最近的村子，目前也拆得差不多了，村民具體拿到多少拆遷費、或甚至會不會拿到，薛晴很懷疑：「要是在台灣那兒，你們大概就去抗議了，可是我們在中國，我們是順民啊」，講完自嘲般地哈哈大笑。她任教的學校要遷到哪兒，老師們也不甚清楚，她很憂慮：「平潭很變態，現在私立學校到處都是，學費很貴很貴的你知不知道？」<sup>29</sup>一般人還是把孩子送去念，不然怎麼辦？過兩年公立的會不會存在你都不知道」；再補充：「以前平潭人不重視教育，讀書幹什麼？隨便偷渡去台灣打工都可以娶老婆，唉唷現在能行嗎？所以只好培養小孩子讀書，那將來還比較有可能賺點錢」，學校萬一被撤，她就失業了，所以今年只好與其他教師集資搞培訓中心。這兩年，每次一見面，她就嚷：「你看平潭現在就是挖挖挖、拆拆拆，我車窗都是灰濛濛的，髒死了，氣死我了」、「物價那更不用說，漲漲漲，我活不下去啦！」所有平潭常民報導人都不清楚實驗區發展的具體走向，薛晴也如其他人一般地想從我這兒取得（或許比較可能）正確的資訊：「你們來這邊，算是考察項目嘛，應該去找政府部門，請他們做嚮導啊」。我表示昨天已經去過管委會：「你也可以過去啊，在那一樓，有個平潭發展圖嘛，請解說員給你解說一下」。她口氣又急又奚訕：「唉呀，那是給比如說開發商，引進外資的，他來專門去說這個東西。我們普通老百姓，他幹嘛跟我說？我們是有千萬、還是億萬可以去投資嗎？」我們這時經過金井灣邊尚未被鏟平的一座小山，壁面上懸掛「大幹一百五十天」的巨型看板，我不解其意，薛晴又嘲諷般地尖聲笑了：「中國的『大幹一百五十天』的意思就是定個指標，在這麼多天裡頭『我』一定要完成的，而且時間越短越好。平潭等於以前是土八路，現在急著要變成新四軍嘛！」笑完後再解釋：「具體的我也不全懂，大概就是說下地基啊、填海啊、海峽如意城開盤啊這些的都得完成」。我表示驚訝：「一百五十天太快了吧？」薛晴的語調越來越尖銳急促：「這個建設非常非常非常快，快到我難以置信，就是，只要我出門去福州比如說三、五天，喔，我就看到它變化。不知道那種變化是讓我是喜是悲，就壓力很大。我每次一回平潭，就覺得壓力很大，就覺得不想在平潭生活了。你看，我這兩年在平潭隨便吃個早飯都要十幾二十塊錢，我上個星期在福州跟我老公兩個人吃，吃得我眉毛都笑彎了，兩碗很大的稀飯，然後一碟肉鬆，然後一個茶葉蛋，還有一個油餅，你知道多少塊錢？才五塊！」她的結論是：「將來平潭是屬於有錢人的地方，平民老百姓我看就是要遷出平潭本島了」。遷去哪裡呢？她又自嘲般地尖聲笑了：「就是（大陸地區

<sup>28</sup> 薛的父親自 1980 年代中以降的二十年間從事兩岸漁產品外銷生意，因此致富，她最愛誇耀之事即為自己在 2005 年結婚時，「我那些台灣的叔叔阿姨哥哥姊姊們啊都過來吃喜酒，好盛大、好有面子啊！他們看我長大的嘛！送了我不知道多少禮物！」約莫在那段時間裡，平潭漁業枯竭，父親事業破產，在當年底移居大連，並借助大女婿的拉美海外關係，改為從事魚鮮內銷行業。

<sup>29</sup> 一般的學費為一學期一千五百塊人民幣，一年三千。與中國教育資源豐富、並藉此區隔城市人和外來農民工的一、二線城市不同，在平潭，農民工以及有能力和意願擔負學費的本地人皆將子女送至私立學校就讀。

離平潭)最近的(福清市)高山(鎮)啊、三山(鎮)啊!我不是去年就告訴過你,說要搞實驗區以後,那兩個地方房子立刻就漲啦,現在也跟福州的房價看齊啦!有遠見的平潭人現在都得考慮去那裡買房,不然你將來怎辦?你房子都給你拆光你要去那兒?」(2012年7月19日平潭田野筆記)

2004年初舊曆年前,我初次赴平潭,當時已有幾位多次往來兩岸的「資深偷渡客」告訴我,連通福清和平潭的跨海大橋「快要蓋起來了」,一旦蓋好,「平潭的房子會漲多少倍你都不知道」,故不斷出於善意地勸我:「你台灣人有錢啊,我們是沒有辦法,你趕快先在這裡買幾套你都無所謂嘛,『到那個時候你就發』(台語)！」源自本文首節所述的兩岸政治關係之變化,平潭海峽大橋在2008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開工,並號稱將在三年半完工,而且在充分服膺中國解放後「追求速度、創造奇蹟」的建設邏輯下,該橋在比原計畫提早九個月的2010年11月30日建成試通車。前述建設邏輯之典範創建者者,顯然是中國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年當日啓用的人民大會堂。該會堂位於北京市天安門廣場西側,為全國人大代表開會、以及迎接邦交國首領的場所;換句話說,此建築視覺性地象徵(iconize)了國家主權的兩個關鍵性元素:國家(即「黨」)與人民的關係、以及本國與其他主權國家的關係。為了藉由展現建國十週年的建設成果,以重新鞏固1950年代末對外(主指蘇聯)和對內(「三年困難時期」)正逢危機的國家主權,該會堂在1958年10月動工,以「創造記錄」的方式在1959年9月建成,而「透過人民自發的力量以克服萬難,因此在不斷創造全世界最短記錄的時間裡,打造全世界面積最大、容積最高等等的項目,也成為「創造中國奇蹟」的典範話語。<sup>30</sup>在中國解放後,平潭因於與台灣的「戰爭前沿」關係,六十年來被排除於上述民族國家權力視覺性展演的場域之外,那麼在實驗區成立之後,被首次納入「向境外展示速度奇蹟」之建國話語語境

---

<sup>30</sup> 比方說,2010年九月底,因應「新中國建立六十年之際」,由北京電視台製作播出的《人民大會堂——神聖殿堂》紀錄片(京華時報2010),便由以下話語貫穿這個「奇蹟敘事」:「為了讓人民大會堂在國慶十周年前竣工,上萬工人們開始了和時間的賽跑,人民大會堂從開工到建成只有十個月,這是一個什麼樣概念呢?舉個例子,聯合國大廈的建成用了七年、而澳大利亞的悉尼歌劇院用了整整十四年」、「這是一個奇蹟」、「創造了另一個令世界驚嘆的中國速度」、「據說世界最大的三角鋼琴在捷克,是十二英尺,那我們就做個十五英尺的吧」、「北京副市長萬里說,今天我們能夠在這裡開會,表示我們勝利了」、「毛主席對萬里說,你是萬里啊,日行萬里,速度快」,等等。

裡的平潭常民如何理解此重獲意識型態公民身分的處境？該語境又是否具體性地承諾了她/他們超越以地域、階級、財富為差異性的「共和國公民身分」？

這三年的田野調查資料顯示，情況並非如此。對於常民，所謂的平潭速度具體彰顯在日難取得的生活基本資源與越趨可見的階級差異之上，且正因為前者的匱乏為建設實驗區的直接結果，而階級差異又直接等同本地人與（特定）外來人（包括該實驗區訴諸的台商、前引薛晴所稱的引資開發商）幾近「先天有異」的人種區隔，以致於平潭開發的速度，不過強化了報導人們早已存在的邊緣（或次等）公民認同而已。就日益匱乏的民生資源而言，比如，該島淡水資源本就稀薄，為求解決供水問題，根據國務院批准的「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規劃」，近期（指五年內）規劃由福清東林水庫調水供應，主島規劃興建兩座自來水廠，然而，嵐島民生用水的問題卻更加嚴峻。這兩年我們赴嵐先後借住本文前節所引的阿輝姊姊阿鳳與下一節將引的美蘭家，二者皆在城關中心，2010年底環島公路開始施工起，阿鳳居住的整個小區完全停止供應自來水，住戶只好集資打口水井引水，由於她家在六層頂樓，抽水馬達功率有限、加以供電不穩定，每日僅有夜裡幾個小時中水龍頭會涓滴出水；美蘭家在另一個小區的一樓，引水問題較不嚴重，然該區實施不定期輪流供水，故而她和阿鳳一樣，習慣性地在住處每個水龍頭下擱放臉盆或水桶集水以作洗澡、煮飯、洗衣之用。再以供電為例，該島無大型發電廠，為了實驗區預定的高科技科學園區和海峽如意城等尖端住宅，規劃主島設置一座五十萬伏、和五至六座二十二萬伏變電站，以及四座風力發電廠，然而民生用電依然緊縮且不穩定，以致於即使高達十層的小區商品房亦鮮少裝配電梯；不預期的分區供電乃屬常態；一般民眾無意購買諸如微波爐、烤箱、吸塵器、電子鍋、電器熱水瓶，等等晚近二十年中國常民社會理解的現代化民生電器，<sup>31</sup>而在氣溫與台北近似的溽暑時節，即使有能力配置冷氣機的住家和商家也絕少開啓空調，否則會有隨時斷電之虞。

故而，純粹以數字呈現的市場價值與開發速度，形同 Michael Taussig（1993：22-23）援引 Walter Benjamin 所述的「金錢/價值幻物」（money-value fetish），透過了「數字幻物」，商品（與巨型國家建設）的榮光遮掩了價格

---

<sup>31</sup> 故而直至今日，嵐島仍乏較大型的家電展場。

(price) 與價值 (value) 乃為社會建構的事實，其本身以及該榮光折射出的國家權力 (本文前稱之「金錢幻術治理術」即為其治理手段的一個面相)，也成為了被膜拜之物。然而，田野資料也顯示，平潭常民對於數字幻物的情感經驗 (affective experience) 是雙元的：她/他們固然極力將自我轉化為追隨該幻物的主體，但是在另一方面，越趨可見的社會階層差異也造成了日常生活中具體感受的苦難 (sufferings)；相當諷刺地，表述這些苦難的指標，也是某種速度幻術——即，彷彿永遠也追趕不上的民生物價和房價。以飲食為代表<sup>32</sup>的民生物價難以負荷的漲幅，是所有該島常民 (尤以成年女性為然) 熱烈交換的談資，綜合兩年多來三十餘位報導人的說法，典型的「痛苦物價」敘事如下，請讀者注意界定「苦難」話語內蘊「實驗區開發後的現在/未開發前」以及「平潭/大陸內地」的時間與空間二元界分：

這幾年在平潭活得真是太難了、太苦了，就算是小市場裡頭賣的東西，也沒有一樣不是一直在漲。你看雞蛋，現在一斤五塊多，以前才三塊幾；豬腿肉，(一斤)十五塊，以前十一、二塊；就算最便宜的豆腐，也漲了一塊多！水果漲更凶，我們就說最普通的蘋果，現在(一斤)五塊五，以前才一、兩塊。什麼都漲這麼多，我老公還能不去交朋友談生意搞項目嗎？交了朋友來家裡吃飯，比較高級的水果不能不去買一買。那你看，這紅皮葡萄，以前(一斤)五、六塊，今年差不多翻一倍，九塊五！水梨，皮啊粗得很，沒人愛吃，吃了要削皮，嫌麻煩，以前才一塊，現在居然要三塊五！我老公都在外地打工的嘛，他也嚇到了，怎麼我們這裡現在物價搞成這樣的呢？他最愛講的就是，蘭州啊、昆明啊、還有武漢啊、南昌啊什麼什麼這些內地，就算是雞蛋，(一斤)最高最高也不過四塊錢！

在新區和城關隨處可見之彷彿道德律令的「買鋪 (或『買房』) 才是硬道理」<sup>33</sup>看板、以及房價的不斷高漲所引發之多重交織的情感 (affects) 效應——期待、恐懼、憂慮、後悔、羨慕、嫉妒、慶幸、驚訝、憤怒、不知所措——更是強烈。晚近數年高速攀升的房價，也成為幾乎每位不論有無購買能力的城關常民的日常生活談資。比如，2006年開盤的第一期「世界城」，一平米剛超過

---

<sup>32</sup> 請讀者注意，飲食固然是民生基本必須，也具有高度的文化 (以及「國族主義」) 價值，故而不乏報導人皆表示：「民以食為天啊，老祖宗就是這樣說的啊」；同樣的案例為「土地」(包括地面上的樓房)：「中國人傳統對於土地的依戀、眷戀啊，認為土地永遠不變嘛，所以，你擁有了樓房，就擁有了土地，而且是可以留傳給後代的」。

<sup>33</sup> 該標語挪用自 1992 年鄧小平南巡深圳時所稱的「發展才是硬道理」一語。



一千元，然而 2012 年二月以「紐約印象」作為廣告訴求的「世界城」第四期開盤時，一平米已達九千元；再以前述的「海峽如意城」為例，開盤價即為八千到一萬元，眾報導人且聲稱漲到三萬指日可期。<sup>34</sup>如前所述，土地（以及其上的建物）對平潭常民而言，不僅是日常生活的居住和再生產空間，更是父系傳承的永續物質基礎、不畏艱苦的男性氣概基本展現要件、以及互相攀比的視覺性展演象徵。然而，自從 2004 年起，可作為投資物且價值隨著所謂自由市場而波動的商品房出現之後，<sup>35</sup>「房子」的形式與意義也逐漸改變；尤其在實驗區成立之後，如阿輝（趙彥寧 2007）與本文第一節所引林平等因偷渡打工「賺了第一桶金」後翻修加蓋或自建樓房的作法，因為土地取得日益困難、由大型建設公司興建的「花園小區」成為住屋時尚、預期房屋增值、以及擔憂樓房拆遷等因素，已屬不可行。故而，恐懼將被迫移居島外者有之（比如薛晴）；慶幸即早在城關建樓，並可藉由租屋給外省農民工以賺取不斷暴漲之房租者有之（比如林平；他將自建樓房的三、四層各自隔為三間租出，在三年之內，每層總月租金「順應市場行情」地由五百六漲為一千五）；因未「即時」購屋，因此自悔大失良機者有之；當然，更多的就是根本無力參與商品房投資，故而羨慕、嫉妒、驚訝、憤怒、與不知所措的平潭常民了。

在時間被顯著可見地轉化為常民無法掌握之市場價值的狀況下，個人未曾預期、以及完全無法理解、更遑論跟得上的「平潭速度」，生產了既存社會道德經濟秩序內前所未有的負面情感。然而，與 James Scott（1977, 1987）以降倡議「弱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之從事弱勢人群研究學者的期待有異，本文報導人既無意願探究、更遑論「反抗」（*resist*）上述與極權的力道（*forces*）無異的市場經濟道德秩序，故而不僅服膺了實驗區的開發邏輯，也間接地強化了國家暴力的正當性，並且再次承認自己確為國境邊區的化外之民（亦即無法

---

<sup>34</sup> 換句話說，將與上海市的高房價齊比。

<sup>35</sup> 這也就是本節前引「資深偷渡客」報導人善意建議我買房之時。即使當時的商品房皆為四、五層高的獨棟住商合一樓房，建築品質亦不佳，至 2012 年，其每平米的價格已翻漲五至十倍、且在不斷攀升之中，故而晚近幾年這些朋友每一見到我，便極度惋惜我的「錯失良機」。至於其不佳的建築品質，2007 年至 2009 年期間偷渡來台在三峽打鑄建築用鋼筋的「摩的」師父阿光，赴台前便從事前述商品房的同類型勞動，他特意舉出大拇指、再轉動大型機車的把手，以示意兩種鋼筋的粗細差別，結論為（一）「所以在你台灣打工真辛苦」；（二）「去你台灣以後，才知道為什麼在我大陸，房子沒事就會倒塌」。

藉由攀援「平潭速度」的共和國「擬公民」)。比如，儘管歷經長達兩年的停水與無預期分區供電的麻煩，對於我「是不是可以跟政府反應一下」的建議，眾人皆覺莫名其妙，「可能你台灣不會這樣所以你不適應」、「這個沒有什麼，我們都很習慣了，而且半夜的時候水也是會出來一點」是最常見的反應。再以房價為例，由於「海峽如意城」等實驗區的標示性房地產規劃對台優惠，與我相熟的報導人莫不央求我以台胞身分代其購買一套，她/他們總是說：「台灣人跟我們各方面本來就是不同的」。那麼，前述個人明顯感受的階級與人種差異，可否引發其對階級差異與社會不義的同感共憐，並進而形塑某種跨地域的底層人民集體認同？顯然也非如此。最明顯的例子表現在實驗區成立後湧入該島的外省勞工身上。根據非全面性的調研觀察，這些主要來自四川、江西、湖北、河南幾個省份的農民工，分別從事建築（四川、湖北、江西）、出租車駕駛（河南）、<sup>36</sup> 公共車駕駛（湖北）<sup>37</sup> 等職，尤以各種形式的建築工（挖地、鋪路、蓋房、拆遷）為然。儘管這些勞動皆在平潭常民日常生活頻繁接觸的物理和社會領域，而且在金井灣等正在積極建設的新區路邊，比比皆是新開設的四川等外省餐館，但是至今我尚未遇到任何一位在地人視外省勞工為可以建立聘僱以外之社會關係的對象、也未曾去過那些餐館消費。對於幾乎所有本地報導人而言，他們甚且是彰顯「平潭確實已經發展了」的實體象徵；比如，曾長期來台打工的平潭男性常面露驕傲地告訴我：「就像你台灣人不願意做的體力活就讓印尼啊泰國啊越南啊那些『落後國家』的人來做的道理一樣，我平潭現在也是這樣」，其結論則是：「我平潭人現在有錢嘛」——儘管相當諷刺（ironic）的，如本文前述，這些男性晚近也紛紛往赴外省從事性質類似的體力勞動；並且，因為追求「平潭速度」而日夜趕工的建築工人日薪至少有三百、而具有長年跨省工作和精明投資（轉賣車牌）經驗的河南籍出租車師傅多月入七至八千元，換句話說，其收入非常可能遠高於近十年來不斷在「暴富夢」裡打滾的平潭男

---

<sup>36</sup> 直到 2006 年，平潭方成立有牌照的出租車行，當年核發了六十張車牌，2007 年增加三十輛，出於招商以及現代化的需求，2012 年成立第二家車行，核發三十張牌照，總共目前有一百二十輛出租車。2010 年左右，近七十位在浙江台州打工數年的河南籍出租車師傅轉來平潭開車，並計畫在實驗區開發後車牌大漲時高價賣出。過去該島長途交通（比如去長樂機場）的主力為本文下一節陳進等人開的無牌「黑車」，而至今城關內的交通仍是「摩的」的天下。

<sup>37</sup> 2011 年底起，基於與前註同樣的因素，島內公共車大幅換新，並增加行駛路線，故而需增聘駕駛員。

性。<sup>38</sup>外省農民工的象徵性社會位置如此「更為化外」，以致於必須在日常生活上與之共處的在地人亦自覺低賤，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租屋：所有因為無法藉由赴外打工或投資項目的報導人，不能不在城關租賃與外省農民工共住的樓房，這個卑污的社會人格如此令人羞慚，僅有極少數此類報導人同意我們參訪其住處。

在不過三年的時間裡，平潭常民的日常生活與心理和情感狀態確實如實驗區的發展口號一般，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至少就目前為止，該變化的主要效應與抵抗「速度暴力」無關，而是再次証成了（相對於台灣人以及內地人）的邊緣或次等公民主體意識，並且在強化附庸暴力權威之必要性之時，也生產了自我與（特定外省）「低賤它者」不可跨越的社會界線。從某個角度來說，商品房的投機性投資（speculation）、與隨機並機巧性地使用與累積匱乏的民生物資，如同稍早幾年不能不遭逢的「外省貪官」一般，不過是這個已然長期進行的國境邊區主體化過程裡，必須學習與協商的必要依附性它者而已；而且與永遠難以捉摸的「外省貪官」類似，投機性市場價格本質上的無從駕馭性，也重新認證了個人和「發展」之間必然分割的關係。故而，唯一安穩的生存之道，顯然便如前引薛晴預測的，及早準備遷至本文最初藉由王戎昌之口所述的「化外般的大陸」。平潭綜合實驗區誇稱將打造的「共同家園」，實為新自由主義資本無限制積累、與之合謀的國營企業、主權國家親近的民族主義、以及該民族主義試圖召喚的境外子民（即以台商為代表的台灣人民）的「共同受益」場址，與平潭常民並無關係。為何國家權威可以如此輕易地區隔在地常民？何以後者能夠不論有意識或非特意地附從這個自我驅逐（與自我卑賤化）的行動？此外，本個案研究對於吾人了解當代中國社會變遷、抑或國家與市場合謀的暴力實作，可以有何幫助？本文最後一節將藉由反思既存道德經濟理論、以及新自由主義自我治理論述，以試圖回應這些問題。

### 三、與金錢政治互構的道德經濟：

#### 「缺乏素質」的國境邊區自我治理主體

<sup>38</sup> 至於這些經驗老道的跨省移動外省農民工們如何訴諸「素質論」，以試圖翻轉其被「比我素質更底下的平潭人」貶抑的敘事與作為，可參見本文下一節河南籍出租車師傅李建黨的案例。

「平潭速度 平潭質量」、「安全生產文明施工 爭創優質精品工程」、「創優質 守信譽 為三航爭光，精管理 出效益 為企業創利」、「責任讓生活更美好」、「維護交通秩序 爭做文明公民」、「豎立交通文明意識 提昇城市文明形象」（2000年至2012年，從金井灣新區到城關裡，一路上看到的「素質」標語）

從福州到平潭城關阿輝家的路上，和開車師傅阿進聊天。阿進的姊姊與阿輝弟媳婦美蘭很要好，他說美蘭偷渡去南非在餐廳打工十年的丈夫阿展前陣子回家了，「南非那邊經濟也不好，平潭現在不是說要搞建設嗎，所以回來看看有沒有賺錢的機會」。阿展爲了在南非拿身分，與某位女華僑辦假結婚，「不知道怎麼回事假的搞成真的，小孩子還給他生了好幾個，錢也不寄回家〔指「平潭的家」〕」，這次「還抱了一個男孩子回來，放在鄉下自己媽媽那裡養，美蘭氣死了」。阿進很鄙夷阿展的作爲：「**南非身分其實不怎樣，南非其實是個窮國家嘛**」；想了一下，又補充：「**可能在南非比較自由，但是說賺錢嘛那混口飯吃也差不多而已**」，言下之意就是：「那麼何必爲了不過混口飯吃，連男人最基本的責任都不顧了？」。他數次表達自己的困惑：「也不知道怎麼講，他看過去很老實，半天不會講一句話的人怎麼會這樣子呢？我也想不透啊！」、「**而且他媳婦很乖啊，什麼事都願意做的那種，現在做直銷，也是蠻想賺錢的那種啊！**」，結論是：「**所以他做人不行！**」

最近很多之前在國外打工的平潭男人都回來了，包括阿進的幾位在八、九年前「做留學」去加拿大的朋友。他估計他們也沒賺錢，所以才回來「找機會」：「他們過去在什麼超市上班，也不會拿很多，**然後他又沒結婚，一個人在那邊賺錢在那邊花，那能剩什麼錢？**」阿進早幾年也想辦假結婚去日本打工，特別去考了廚師證照，也繳了三萬人民幣的首付，但是在日本的蛇頭被抓，線就斷了，不過他現在認爲：「留在大陸賺錢也是不會輸了出國還是哪裡」。2009年三月福建省開始進行福清到平潭跨海大橋的建設，阿進入股包下橋面上LED路燈設置的通訊公司，不包括年終分紅，可領三千五百元月薪；我稱讚他能幹，他表示：「**你做什麼事，就是要跟得上潮流、跟得對潮流，那麼就賺錢，在大陸還是在哪裡，都是一樣的道理，所以這也沒什麼**」。妻子剛生兒子正在坐月子，他請了一個保母在家裡帶孩子，月薪兩千五。阿進覺得不貴，他有個朋友在福州請月嫂要付四千五，又說：「還有特級月嫂，每個月一萬多都有的，她懂得服侍坐月子的婦女，帶小孩帶的也比較厲害」；他自滿地表示：「**這個錢沒什麼，這個是男人最基本的責任嘛**」。阿進說，直到兩年前開始蓋大橋，平潭人「很落伍的，女人生孩子坐月子就在鄉下老家，給老人家照顧，有的老人家成天打牌，所以也沒有什麼照顧，女人自己也不怎麼會照顧，小孩子就隨便讓他長大，我自己就是這樣啊」。他的結論是：「平潭照這樣發展下去，現在物價啊、房價啊都高過福州了，一般沒有辦法搞到項目的人是很辛苦，可是現在山挖掉了，鹽海也填平了，有辦法搞到項目的人，肯定就有機會。平潭人以前太窮了，才去歐洲啦、美國啦、日本啦、還有你台灣

啦打工，現在不需要了嘛，留在老家又能賺錢又可以照顧老婆孩子，你說這不是很理想嗎？」（2010年七月十五日，從福州到平潭田野筆記）

前天拜訪王金，2006年三月遣返回來後，他趕上「搞項目」的潮流，「七七八八地賺了一點」，可是「現在隧道不好搞，查得很緊，你看前幾天江西那邊還有武夷山那邊不是說高速橋都給它垮了」，所以轉投資去青海「搞礦產」，也在平潭搞一些比較小的項目，比如長途載客轎車車行和房地產。前天他自己開輛 SUV 載我們環島看各種正在大興土木的實驗區建設，在金井灣「兩岸合作 先行先試」的大看板前，還語帶豪氣的表示：「平潭現在有錢啊，國家給平潭一天一個億，有錢就好辦事，現在就缺人才而已，平潭的觀念已經在改變了，像你們啊、香港的啊、華僑啊新的血液進來，平潭就不會像台灣人這樣坐井觀天，我們現在跟世界接軌嘛」，又說「台灣人就是忌諱很多，什麼怎樣的就不能搞，我們沒有這樣」。今天搭王金投資的車行轎車去福州，車子很新，是輛黑色奧迪（Audi），但車門一開，就聞到車裡參雜體味和煙味的強烈臭味；兩個小時車程裡，師傅阿弟不斷打手機用頗高的聲量以平潭話與人談事情，感覺是各種投資項目，不時搖下車窗往外吐痰。原先講好了到福州市華林路的如家快捷酒店，但是快進入晉安區時，他卻先說路不熟、後來又說不順路，要把我們放在路邊自己打的過去，我盡可能地怒吼般地理論，他才勉強地駛去預定地點，但不斷大聲埋怨：「華林路？我沒聽過有這條路！」抵達酒店門口，他聲稱多走了這麼遠，要多收五十塊，我扔給他原訂的三百元車資，與助理趕快下車卸行李，師傅站出車門怒罵：「台灣來的有什麼了不起？我根本看不起你！」我故意高喊：「你不要打我！」他回：「我打你又怎麼樣？」，一副要衝過來揍我的樣子，這時見到酒店服務人員出來觀望，他才悻悻然地把車開走。在酒店服務台辦理 check-in 手續時，我打手機給王金，希望他「反應一下」，他很尷尬：「這個.....我去過台灣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這個.....平潭人的素質就是這麼差，還是要很久才趕得上（台灣）」。（2011年7月13日由平潭去福州田野筆記）

本文前一節提出「為什麼平潭人願意附庸金錢幻術治理」的問題；對此，讓我們先回顧既存的道德經濟文獻。受到 Bronislaw Malinowski（1984/1992）等經濟人類學者的啟發，英國勞工史學家 E. P. Thompson（1971）重新審視十七世紀中至十八世紀初英國農村層出不窮的「糧食暴動」，認為此類事件不可化約為麥糧供需不均因此造成的飢饉生物性需求，而引發的社會衝突行動，而應視為由前現代社會過渡至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伴隨政治經濟體之變化而發生的道德秩序失序現象。這個現象反映了以下社會史的事實。首先，在自由主義經濟市場邏輯全面體制化、和中央政府統一調控貨幣經濟之前，不僅俗民（尤以農民、各類小工匠和與購買麥糧關係最密切的婦女為然）常將衡量經濟行動

的損益準則，常與其所屬之經濟文化社群常規化的道德判准模式互相強化和應證，派駐當地的行政首長也常自命為家戶長式（paternalistic）道德秩序守護者，故多藉由柔軟的身段和多種變通手段以回應所謂「暴動者」的需求；換句話說，於日常生活行動緊密關連的在地社群中，「暴動者」和「政治權威者」之間擁有相當程度的互相理解與彼此依存的关系，而生產並正當化這個關係的社會脈絡即為 Thompson 試圖申論的「道德經濟」場域。亞當斯密在《國富論》

（Smith 1776/2003）中揭櫫的「不干涉主義」（Laissez-faire）固然成為日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信念，然而該理論所墊基的「追求最大經濟利益」原則，並非支配暴動者的核心行動邏輯，否則這些人士便不會常以毀棄已奪取的麥糧，而做為發洩憤怒以及（更重要的是）重申社會正義的手段。第三，對於參與暴動的行動者而言，真正破壞既存社會正義和道德經濟秩序者，乃是自歐洲中古世紀以降逐漸取得社會正當性的收購商和中盤商，其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以牟取暴利的商業行為不僅違反常民社會對於（道德和經濟）「價值」的理解，也造成了鄉民和經濟作物之間的疏離關係。最後，Thompson 指出，麥糧暴動於十八世紀中葉起逐漸消失的現象，應歸諸於現代國家制度的興起，易言之，道德秩序乃隨整體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之轉變而有所不同，故而深刻形塑了個人對於社會能動性、權威、社會正義和集體行動的理解和實踐。

道德與經濟價值的意義和判准模式，顯然是理解變遷社會之道德經濟的關鍵取徑之一，而商業活動（尤以商品交易為然）的可實作方式，亦與勞動的價值、分類、及其可被正當化的範疇息息相關。歷來不少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藉此以試圖闡釋上述議題。在歷史學界，比如說，Jacques Le Goff

（1980a；1980b）這位墊基「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研究的第三代年鑑學派學者，便藉由分析九至十三世紀法國神學知識分子的論述、城鎮生活的具體物質象徵（譬如由日晷到大鐘的計時器變化）、文化產物的再現形式（譬如宗教畫作的透視角度變更）等社會史素材，以說明何以在這段過渡至現代社會的歷史階段中，新興商人階級可逐步擺脫早期放貸者「僭越神的時間」之罪惡形象，與正統意識形態的生產者（即僧侶和神學家）互相讓步協商，以建構一全新的道德經濟秩序；該道德經濟秩序的重整暗示了既存社會中勞動分工、範疇、及其社會價值的認可，Le Goff（1980c）因此也分析了諸如軍人、農民

工、各類小工匠、以及娼妓之勞動意義的正當化過程。在文化人類學界，英國人類學者 Paul Bohannan (1955; 1959) 在上世紀中葉非洲尚未解殖之前，即藉由分析奈及利亞 Tiv 族一般互不相屬的三層經濟交易領域（家戶經濟作物、可累積個人道德聲譽和經濟地位的奴隸與牲畜、可與其他社群「互換結婚」以維繫整體社會再生產秩序的女性親屬），以闡釋道德秩序和經濟交易之間的互相建構關係，並指出伴隨西方殖民勢力入侵的全球化商業體系，異化了 Tiv 族人與土地和農業作物的多重親密關係。此外，James Scott (1977, 1987) 分析解殖前後東南亞農民對於社會關係和自然環境之感知與實作的變化，指出在前資本主義時期，農作收成被理解為無可預知的上天安排，農民據此發展出的長期穩定耕作方式、以及禮物互惠、土地共有、和勞動分工等經濟活動，均源自前述道德經濟和價值估量邏輯；然而，西方殖民勢力以富含資本主義色彩的理性精算與追求國際市場經濟利益之政府政策深入農村生計領域，在短短十年之中暴力地轉化了在地社會的傳統經濟模式，且當殖民國家面臨世界性經濟危機時，又經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操作方式，將在地經濟衝擊轉移為政治權力的競逐。綜合前述研究發現並批判性地回顧百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界的相關理論，Jonathan Parry and Maurice Bloch (1989) 這兩位英國經濟人類學者指出不論在西歐資本主義抑或其他經濟體系的人類社會，商品經濟與壯似與貨幣制價無關的互惠型經濟活動，皆需與既存社會的道德秩序互相建構，方可同時取得經濟和道德層面的多重價值、以及在常民社會中的可被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

以上對於有關道德經濟的理解典範，顯然預設了貨幣經濟與互惠經濟無涉（或甚至對立）的必然狀態。然而，田野資料顯示，對平潭人而言，二者不僅緊密扣連，貨幣經濟且總被引用為合理化既存社會關係的至高合法性守則；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金錢幻術早已與性別/親屬意識型態互構，成為平潭在地常民的核心道德經濟準則。比如，過去十年裡，不論在台灣的「大陸人民收容中心」、建築工地等無證入境男性的勞動地點、偷渡或假結婚來台女性工作的廣義情感勞務場址（醫院、「小吃店」、酒店）、以及平潭原鄉家裡，對於「你為什麼會想來（或「去」）台灣」、「你現在最想做什麼」、「你接下來想做什麼」的問題，所有報導人的回答皆是理所當然的「我想賺錢」（或「我要賺錢」）。然而，與其說「被賺到的錢」是個可藉此有意識地轉變生活風格或階

級認同的途徑，不如說「賺錢」這個行動本身是證成主體之社會存在價值的關鍵（也是幾乎唯一的）手段，而該價值又必須鑲嵌在在地社會關係（尤以家族關係為然）的倫理實作網絡中，方可「被價值化」。<sup>39</sup>如趙彥寧（2007, 2010）以及本文前節所述，在 2005 年以前偷渡經濟當道的時代，冒著生命危險成功勇渡台灣海峽，是男子成年禮的第一步驟，而成功地「賺了第一桶金」，並將之匯款回家興建樓房並結婚育子，是該成年禮的完成步驟。<sup>40</sup>本節前引開車師傅陳進的說法清楚地指出了這個「男性貧富道德邏輯」：女性的職責僅在生育子女（尤其是兒子<sup>41</sup>），但其無法善盡子女照顧者的「落伍」性質與「（應該及早）過去的」平潭社會性無異（或具有互相應證的道德價值對應關係）；因此，理想男子氣格（masculinity）便應具體表現在機敏地辨識「潮流」並以適當方式參與之，再以該行動的回饋（「賺錢」）履行可親身監督的夫職與父職（比如，雇用適任的月嫂<sup>42</sup>）；故而，「錢」既實質也象徵地區分了在地社會以「貧窮（因此必須出外打工）的過去」二元對立於「可以追上潮流地賺錢的此刻」之時間性（temporality）。也正因為如此，如趙彥寧（2010：186）有關理想母

---

<sup>39</sup> 換句話說，「貧窮驅策說」不足以解釋平潭以及其他閩北偷渡鄉人士為何似乎不能不出外打工的動機。

<sup>40</sup> 另，上岸後若可順利逃脫境管局（或移民署）和海巡署的查獲，以自購漁船的方式再偷渡返鄉，會更顯其男子氣概的優越性；沒有一位有此背景的報導人，不會在訪談伊始便得意地表示：「我跟別人不同，我是自己回來的，我沒有被靖廬關過」。另，所謂「自己回來」的作法，為雇用台灣漁船主將其載返平潭。

<sup>41</sup> 而且最好不只一個。以本節前引王金為例，他二次以假結婚的方式赴台打工時，妻子甫產下長子，2006 年遣返回鄉後，她「要求」再生一個，為此王金繳了近兩萬元的超生罰款，我問「划得來嗎？」，他有些驚訝地表示：「什麼划不划得來？當然划得來，錢會笑啊！」意即，「兩萬元」與「超生的兒子」之間不存在實質的貨幣對價關係，若非要對價，那麼兒子的「價值」當然遠高於人民幣，所以「錢」就跟王一樣，會「笑」。

<sup>42</sup> 在王金的例子裡，由於四歲的小兒子已過需月嫂照顧的年歲，如何「適當」培養其興趣和能力，是這個階段理想男性氣格的至高任務。當天他載我們自駕遊的主要目的，是讓全程緊抱的小兒子觀看遍佈全島的挖機（即挖土機）；每一見到，王金便指著對孩子說：「你看，挖機！挖機！」，孩子也開心地叫嚷：「挖機！挖機！」他心滿意足地告訴我們，小兒子學步起，他便為其購買挖機模型玩具，孩子很頑皮，沒多久就拆爛了，對爸爸嚷：「它壞了！」王金就再買一個，至今已購買六十幾具，堆滿在客廳裡。挖機的意義為何？他說：

大孩子成長的時候我在台灣所以帶不到，現在十一歲了，跟他媽一樣，害羞，見不得人，學習還可以，在班上都是二、三、四名，可是不運動，一米六五現在，一百二十斤〔按：六十公斤〕！我想這個小的孩子這樣可不行，我現在在家啊！所以要給他「挖機教育」。挖機就是建設的意思嘛，你沒來挖機把這山啊、鹽海啊、墓地啊、鄉下的石頭房子啊什麼的給挖掉，就不會有進步嘛。我在台灣的時候，也開過好陣子的挖機啊。所以你看，這個孩子就是跟老大不同，皮得很呢！〔得意地呵呵笑〕



職敘事的論文所述，被迫仰仗妻子赴台打工養家育子的已婚男性，也僅能借助貨幣評比敘事（「所以我們這裡現在女的比較值錢，男的不怎麼值錢」）以衡量自我和親密關係的價值，而足以養家的女性彷彿可輕易拋棄人妻與人母之職的態度，<sup>43</sup>在前述道德經濟網絡裡，顯然也不令人費解；本節前引王金與我們自駕遊時，他便平靜地表示：「女的假結婚出去的，大概十個會『去掉』〔意指「與原婚姻家庭斷絕關係」〕七個，連人都消失了」，再解釋：「我們大陸跟台灣不一樣，女的結婚就賴在家裡，她一直在家裡就覺得『我老公還可以』，因為老公在外頭打工他按時把錢給寄回來嘛。可是假若哪天她自己也出去外面闖一下，『他媽的我老公也不怎麼樣！』」——換句話說，夫妻關係的情感價值已相當程度地貨幣化了。依循這個道德經濟邏輯，「在外打工並按時匯款養家的老公」，也成為所謂的「留守婦女」們之間互相攀比的關鍵要件：比如，我們拜訪因江西的隧道工程發生問題而返家另覓致富項目的林平時，我問他妻子「你老公好不容易回來陪你，你一定很高興吧」，她卻表不滿：「不高興。我氣死了。男人就是應該在外面，你回家做什麼？回來就表示你不會賺錢，我丟臉死了」；<sup>44</sup>也因此，本節前引阿進師傅大惑不解既然美蘭「很乖啊，什麼事都願意做的那種，現在做直銷，也是蠻想賺錢的那種」，她的丈夫阿展卻不僅無視「男人最基本的責任」（即外出打工賺錢以撫養妻兒）、而且連「人」都「做」不夠格（即一方面把「做男/人」的自我治理義務強迫性地委由妻子進行；在另一方面，不但在根本不值得取得公民身分的「窮國家」待了這麼長的時間，還濫用了其假結婚的身分以遂行雙重婚育之實）。

不過，以上分析仍不足以解釋這個問題：當金錢幻術政治以國家權力的姿態進入平潭後，經由無法預期的危難（比如，住地拆遷、與民生物價的不斷高昇）所引發之如前一節所述諸種負面情感交織效應、或甚至如薛晴等已然預期終將被逐出島外，在地常民不僅無意去魅金錢政治的幻術本質、反而更加努力

---

<sup>43</sup> 比方，「陳美」這位報導人所說的：「如果不得已被你台灣警察抓到要遣返，那我回去，不用嫁了，不要再找老公了，我怕透了。小孩子如果他有辦法養，就給他好了。」（趙彥寧 2010：198）

<sup>44</sup> 丈夫們也會援引同樣的道德經濟語彙以合法化其行爲。比如，當日林平與我們在餐廳吃午飯時，便抱怨妻子對於他「回家了還老是往外跑」的責怪「很不懂事」：「我跟朋友上酒店、吃夜宵，還不都是在找搞項目的機會？」由於平潭常民缺乏正統社會的文化資本與關係網絡，男性赴外地打工的活動多在此類社交場合裡締結。

地投身自身彷彿已知永遠追趕不上的「平潭速度」（或陳進所謂的「潮流」）、並且顯然完全不具 James Scott 等道德經濟學者所致力分析的抵抗行動呢？我認為原因如下。首先，「如何抵抗」以及「為何抵抗（或不抵抗）」本身可能就是相當有問題的提問：如同 Lila Abu-Lughod（1990）藉由 Bedouin 婦女研究所指出的，受到 Pierre Bourdieu（1977）和 Antonio Gramsci（1971）有關日常生活實作與意識型態效應議題的影響，1980 年代起對於日常生活層面之抵抗研究蔚為風潮，然而不少學者浪漫化了抵抗的意義，<sup>45</sup>以致於將探討重點置於尋找抵抗者並闡釋抵抗的作為，而偏乎了分析權力（或霸權）的形貌；她因此翻轉了 Michel Foucault（1978：95-96）「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的名言，提出藉由抵抗形式以理解權力形貌及其施為的看法。延伸而論，在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的晚近人類社會裡，我認為 Abu-Lughod 的概念宜再做修正：「不抵抗」的作為（包括無感、放棄、附和、熱心服膺等等形式），乃為深入理解國家（以及跨國經濟）政體之權力運作模式的關鍵途徑之一。那麼，本研究提供的田野資料，可以如何有助於吾人理解中國國境邊區（或甚至廣義的偏鄉地區）常民日常實作與權力間的關係呢？

受到晚年 Michel Foucault（2008）有關新自由主義政體與自我治理技術（technique of the self）之看法的啟發，Ann Anagnost（2004）、Hairong Yan（2003）、李紀舍和黃宗儀（2010）等中國研究的學者已分別藉由城市中產階級教育、農民工招募、企業家主體敘事等課題，以闡釋（文明、文化、人口，等等）「素質」如何成為晚近中國中央管控與市場經濟的關鍵治理模式。如 Anagnost 與嚴海蓉（Hairong Yan）所述，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運作下，含義曖昧故而語意彈性甚大的「素質」一詞，併合了城鄉分離的戶口與資源分配制度、高等教育機構的快速私有化、以及經濟發展引發的巨幅農民工遷移等現象，成為了文化領域中力道極大的城市新興中產階級自我治理手段。該手段造成的效應不僅在於本質化了農民工「與生俱來」（故而無從提昇）的「低劣素質」、故而合理化了排除這些人士與其子女使用城市資源和設施（尤以教育為然）的規範，也強化了本身以彷彿似積累資本般「自我提昇素質」的行動；其終極的效應，便是反覆證成了與國家權力合謀的新自由主義跨國政經治理技術之

---

<sup>45</sup> 她因此將該文主標定為「The Romance of Resistance」（或可譯為「抵抗的羅曼史」）。

必然性。不過，上述論點固然深具啓發性，相關學者卻極少分析農民工以及農村人民與素質治理術的認同關係。本文田野資料顯示，至少就平潭而論，農村常民不僅顯然無異議地擁抱「自我素質低落」論，管委會高層也訴諸該論述以解釋平潭發展計畫的進程與限制。就治理者來說，首先，諸如「平潭速度 平潭質量」、「維護交通秩序 爭做文明公民」等等大幅樹立於交通幹道上的標語，明顯指出嵐島人民若要成為「文明公民」，其「質量」需予提昇。其次，2012年七月我們與管委會高層行政人員面談時，對方也表示，實驗區發展與招（台）商不如預期，乃與該地常民「素質太低」直接相關，而由於「提高素質需要花很多年的時間」，這也就暗示了，若該區建設無法按照預定目標地達到「五個共同」的目的，皆是平潭島民本身的問題。<sup>46</sup>

就被治理者來說，前引王金對於阿弟師傅「欠缺素質」的說法即為一例。類似案例不勝枚舉，且此說幾可適用於任何事物。比如，前一節所引薛晴載我們觀覽金井灣途中，在加油站加油時員工無視於不斷插隊的摩托車騎士（即，尚無能力購買轎車者），她便憤怒地表示：「你看看，平潭人的素質就是這麼差！」、「老百姓的素質這麼樣，你覺得平潭發展有可能成功嗎？」。再比如，2011年七月中，我們在美蘭、弟妹阿珠、和好友玲玲合資開設的直銷美容店聊天，得知台灣乃全球生育率最低之國家、且女性結婚意願日趨降低時，她們起先如歷年來我所有的中國報導人般地表示驚詫與不解，經解釋後，個性最活潑的阿珠睜大雙眼興奮地表示：「所以說我們這裡人就是素質太低，教育啊訊息傳播啊什麼的水平都不夠，我們這裡的女人哪裡曉得原來還可以不結婚！」美蘭與玲玲熱烈討論後的結論則是：「我們這裡還是社會福利的素質很差，像你台灣那裡的話，素質高，沒有小孩子沒關係，你老了政府也會照顧」。

---

<sup>46</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高層行政人員皆非出自本籍；而我們訪問過的外省農民工，也多訴諸「素質論」以貶駁平潭人。比如，2012年七月底某日我們所包的河南籍出租車師傅李建黨便多次表示自己外出打工十五年，因為開貨車和出租車的因素，去過幾十個省市，而「平潭是素質最差的」、「應該是全中國素質最差的」；他且以車行本籍老闆不願採納河南師傅有關管理和行銷制度更新一事為例，以說明「平潭人不可能有辦法提高素質」的論點：

他不過就是早幾年去甘肅啊貴州啊挖隧道賺了一筆錢，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就說我們在老家沒辦法過活，才來平潭開車，我們什麼都不懂。他哪裡會想到我們開車的哪個發達的城市沒去過？什麼樣的老闆沒跟過？我們只是懶得講：你在我們眼裡不過是個土包子，什麼都不懂。反正嘛再過幾年車牌漲了我們就把它賣掉，沒人稀罕在這裡多留幾年。平潭人坐井觀天，天生地就是素質差，沒有救。所以嘛以我看，實驗區真的要搞好，那還早呢。

上述報導人的說法，皆彰顯了這個敘事與認知世界的邏輯：平潭常民不僅服膺「自我素質低落論」，且其參照比較的（想像性）對象，既是中國內陸城市，更是本文伊始藉由王戎昌和廖金德小舅指出之「擋到平潭」、和「空飄美女照片」的台灣。換句話說，晚近新自由主義主導的中國政經政策，固然應證了李紀舍和黃宗儀（2010：57）所述，威權黨國機制因應崇尚個人經濟自由之市民社會的治理模式，而平潭代表的海西特區常民彷彿期待被治理（governed）之心態（mentality），也顯示了如 Foucault（2008：295）所指出的：「統治技藝之所以得以遂行，必有其參照範疇，亦即治理術的實作場域；經由治理，這個通常被稱作市民社會的實作場域，也成為新生的社會事實」。<sup>47</sup>意即，「背對且以永遠低劣位置反差著」台灣而形塑兩三個世代的平潭主體，即是前述黨國機制治理術的必要參照範疇；也正因為這個「差異比對的低劣主體性」伴隨著席捲全中國的金錢幻術魔力，才使得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建設彷彿通行無阻。而平潭綜合實驗區的研究案例，或許可以提供吾人進一步理解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與國家治理之交構關係的運行方式、及其在地的社會效應。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書目

大洋，2002，《中國第一女貪官》。北京：金城出版社。

王小魯，2007，〈我國的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比較》31：35-56。

中國社科院，2009，《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北京：中國社科院。

平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8，《平潭縣誌》。福建省福州市：方志出版社。

平潭縣統計局，2010，《2010 平潭統計年鑒》。福建省平潭縣：平潭縣統計局。

自由電子報，2012，〈國台辦批陸委會 立委：對馬下指導棋〉，3月1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mar/17/today-p1.htm>，取用日期：2012年8月8日。

---

<sup>47</sup> 正文引言為我的翻譯；原文如下：

The art of governing must be given a reference, a domain or field of reference, a new reality on which it will be exercised, and I think this new field of reference is civil society.

- 李紀舍、黃宗儀，2010，〈新自由主義經濟人的生命政治：中國富商傳的企業家主體敘述〉。《文化研究》11：55-82。
- 何能高，2006，《胡常清：墜落的政壇流星》。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 李照興，2012，《燃後中國 Post China》。香港：天窗。
- 李鴻階、廖萌、林在明，2010，〈福建和東部地區競爭力比較與提昇策略〉。《綜合競爭力》4：76-83。
- 周飛舟，2010，〈大興土木：土地財政與地方政府行爲〉。《經濟社會比較》26：77-89。
- 周飛舟，2012，〈財政資金的專項化及其問題：兼論「項目治國」〉。《中國社會學刊》32（1）：1-37。
- 京華時報，2010，〈北京衛視國慶巨獻 大型系列片《人民大會堂》〉，9月29日，<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tv/sinacn/20100929/23371871638.html>，取用日期：2012年9月8日。
- 華夏經緯網，2011，〈福建解讀“十二五”規劃綱要：提速平潭開發〉，3月30日，<http://big5.huaxia.com/tslj/rdqy/fj/2011/03/2352441.html>，取用日期：2012年9月7日。
- 新華社，201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3月16日，[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838.htm](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838.htm)，取用日期：2012年9月7日。
- 福清新聞網，2011，〈平潭速度：1天1個億 1天1個樣 20年再造1個廈門〉，5月5日，[http://www.fqxww.cn/news/fjnews/2011-05-05/31663\\_2.html](http://www.fqxww.cn/news/fjnews/2011-05-05/31663_2.html)，取用日期：2012年8月20日。
- 新浪房產，2012，〈海峽如意城雍景苑火爆開盤創「時光」奇蹟〉，6月14日，<http://fj.house.sina.com.cn/scan/2012-06-14/183554290.shtml>，取用日期：2012年9月11日。
- 趙彥寧，2007，〈親屬連結、社會規範與國境管理：中國福建省無證移民的研究〉。《台灣社會學》13：129-191。
- 趙彥寧，2010，〈跨境母職公民身分：變遷中的中國閩北國境邊區道德經濟〉。《台灣社會學刊》44：155-212。
- 鳳凰週刊，2011，《中國貪官錄》。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 二、外文書目

- Abu-Lughod, Lila, 1990, "The Romance of Resistance: Tracing Transformations of Power through Bedouin Women." *American Ethnologist* 17(1): 41-55.

- 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Monthly Book Review.
- Anagnost, Ann,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Quality (Suzhi)." *Public Culture* 16 (2): 189-208.
- Anagnost, Ann, 2006, "Strange Circulations: The Blood Economy in Rural China." *Economy and Society* 35.4: 509-529.
- Bohannon, Paul, 1955, "Some Principles of Exchange and Investment among the Tiv of Central Niger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57: 60-70.
- Bohannon, Paul, 1959, "The Impact of Money on an African Subsistence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 491-503.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k-Morss, Susan, 1991,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apkis, Wendy, 2005, "Soft Glove, Punishing Fist: The 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 In Elizabeth Bernstein and Laurie Schaffner, eds., *Regulating Sex: The Politics of Intimacy and Identity*, pp. 51-65.
- Chen, Nancy N., 2008, "Consuming 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in China," pp. 133-50. In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eds. Li Zhang and Aihwa O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roll, Elisabeth, 2006, *China's New Consumer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Demand*. New York: Routledge.
- Davis, Deborah S., 2000,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rquahar, Judith, 1996, "Market Magic: Getting Rich and Getting Personal in Medicine After Mao." *American Ethnologist* 23.2: 239-57.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Foucault, Michel, 2008, "Eleven: 28 March 1979," "Twelve: 4 April 1979." Pp. 267-289, 291-316. In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New York; Picador.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Harvey, David, 2006,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2001,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 Le Goff, Jacques, 1980a, "Merchant's Time and Church's Time in the Middle Ages." In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pp. 29-4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 Goff, Jacques, 1980b,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From Medieval Time to Modern Time." In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pp. 43-52.
- Le Goff, Jacques, 1980c, "Licit and Illicit Trades in the Medieval West." In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pp. 58-70.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84/199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 Margold, Jane A., 1995, "Narratives of Masculinity 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Pp. 274-298 in *Bewitching Women, Pious Men: Gender and Body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Michael G. Peletz.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arry, Jonathan and Maurice Bloch, 1989, "Introduction: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Pp. 1-32 in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edited by Jonathan Parry and Maurice Blo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 Stanley. 2004. "The Victory of Materialism: Aspirations to Join China's Urban Moneyed Classe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China Journal* 51: 27-52.
- Sahlins, Marshall,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Chicago: Aldine-Atherton.
- Scott, James C., 1977,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Resista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C., 1987,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dam, 1776/2003,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Bantam.
- Taussig, Michael, 1993,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New York: Routledge.
- Thompson, E. P., 1971,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50: 76-136.
- Veblen, Thorstein, 1967,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bve Class*. New York: Penguin.
- Yan, Hairong, 2003, "Spectr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interpreting the Labor Mobility of Rural Young Women in Post-Mao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0(4): 578-596.
- Zhang, Li, 2008, "Private Homes, Distinct Lifestyles: Performing a New Middle Class," pp. 23-40. In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eds. Li Zhang and Aihwa O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Ziz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